



● 传统文化研究书系 ●

史记概论

SHI JI GAI LUN

张新科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记概论

主 编 张新科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雅琴 (渭南师范学院)

王 双 (唐山师范学院)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

刘 宇 (西安文理学院)

刘生良 (陕西师范大学)

池万兴 (西藏民族学院)

张新科 (陕西师范大学)

凌朝栋 (渭南师范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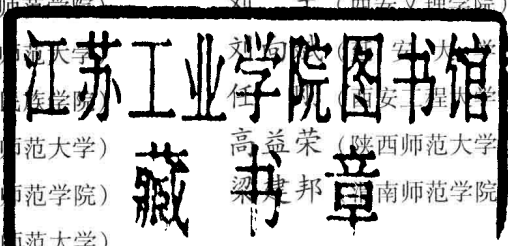
程世和 (陕西师范大学)

刘 宇 (西安文理学院)

任 宇 (西安文理学院)

高益荣 (陕西师范大学)

梁建邦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JC9N06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概论/张新科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613-4685-3

I. 史... II. 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 ②史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053 号

史记概论

张新科 主编

责任人	安雄
视觉设计	吉人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8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前言

《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深入进行《史记》教学与研究,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启迪智慧,增长知识,陶冶心灵,培养和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在京师设“四学馆”,招收门徒讲学,其中的“史学馆”专研历史,《史记》被列入教学内容。但真正开《史记》教学先声是在隋唐之际。《隋书》卷七十五载:“大业中,包恺为国子助教……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北史》卷六十载:“大业初,授李密亲卫大都督。李密折节读书,尤好兵书,诵皆成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恺门徒皆出其下。”说明《史记》在隋代已被列入国子监教学内容。唐代以后,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史记》被列入升官晋级的必读书目。到近现代时期,梁启超、郑鹤声、鲁迅、朱自清、叶圣陶、李长之、朱东润、翦伯赞、郑振铎等著名学者都在大学的史学课和文学课中讲授过《史记》。新中国建立后,《史记》教学得到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史记》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中文等院系的课程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开设的课程层次多样,有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函授生,还有远程教育的电视大学、网络学院等。《史记》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陕西的高校开设《史记》课程起步较早,范围也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适应《史记》教学,我们联合陕西以及其他地区兄弟院校开设《史记》课程的教师编写了这本《史记概论》教材。与其他教材相比,本教材更注重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专题论述,对《史记》的价值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史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勾勒,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史记》,认识司马迁。第二部分为作品提示,选择《史记》精彩篇章或段落,能与论述部分相印证。每篇前有阅读提示,使学生能通过作品认识问题,避免抽象议论。另外,为了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每章后列有三个左右的思考题,以便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本教材分工撰稿如下:第一章马雅琴、凌朝栋;第二章任刚;第三章王双;第四章王长顺;第五章池万兴;第六章刘宁;第七章刘向斌;第八章梁建邦;第九章王长顺;第十章高益荣;第十一章张新科。作品提示部分:程世和、刘生良。最后由张新科统一全稿。

欢迎广大读者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陕西师范大学“211 工程”建设处、文学院对本教材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2009 年 6 月

目 录



史

記

綱

論

专题部分

第一章	《史记》成书的时代背景		(1)
第二章	《史记》的体制及宗旨		(14)
第三章	《史记》的百科全书特征		(33)
第四章	《史记》的进步思想		(44)
第五章	《史记》与民族精神		(59)
第六章	《史记》的叙事风格		(70)
第七章	《史记》的写人艺术		(82)
第八章	《史记》的语言成就		(98)
第九章	《史记》的抒情色彩		(113)
第十章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 价值与地位		(126)
第十一章	《史记》研究史略		(141)

作品提示部分

《五帝本纪》(节选)		(158)
《项羽本纪》(节选)		(160)
《高祖本纪》(节选)		(162)
《吕太后本纪》(节选)		(164)
《六国年表序》		(166)
《平准书》(节选)		(168)
《越王句践世家》(节选)		(172)
《赵世家》(节选)		(175)

《孔子世家》.....	(177)
《萧相国世家》	(187)
《留侯世家》.....	(190)
《陈丞相世家》(节选)	(196)
《伯夷列传》.....	(198)
《孙子吴起列传》(节选)	(200)
《商君列传》.....	(202)
《张仪列传》(节选)	(206)
《平原君虞卿列传》(节选)	(209)
《田单列传》(节选)	(211)
《刺客列传》(节选)	(213)
《李斯列传》.....	(218)
《淮阴侯列传》	(227)
《田儋列传》(节选)	(235)
《张丞相列传》(节选)	(237)
《酈生陆贾列传》(节选)	(239)
《张释之冯唐列传》(节选)	(242)
《汲郑列传》(节选)	(244)
《大宛列传》(节选)	(247)
《游侠列传》.....	(250)
《货殖列传》(节选)	(254)
《太史公自序》(节选)	(258)

史

記

錄

論

第一章 《史记》成书的时代背景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期,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一部《史记》,使他成为彪炳史册的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我国继孔子之后历史文化界的最伟大的巨人。本章从六个方面探讨《史记》成书的时代背景。

一 天下一统——《史记》成书的政治背景

《史记》开卷起自黄帝,寓意于颂扬大一统。《史记》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忠臣义士,追祖溯源,皆归本于黄帝。中华民族皆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就奠基于《史记》。西汉在经历了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这几代皇帝的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以后,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强盛时代。一方面,汉武帝采取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策略,击胡攘越,开拓疆土,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另一方面,内兴功作,采取措施,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建立和完善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加强了大一统的皇权统治,造就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这个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汉武帝

第一,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总结历史成败使《史记》产生成为必要。汉高祖就曾经对自己得天下、秦所以失天下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一批政治家如贾谊、晁错、贾山、陆贾等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看法。陆贾帮助汉高祖找到了秦亡的教训:“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①《史记》成书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件划时代

^① 陆贾:《新语·无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的大事,它既是司马迁深邃思想和惊世才华的完美体现,更是汉王朝大一统宏伟气势催生的时代产物。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大和稳固,形成了对历史经验进行学术综合的迫切要求,为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中指出,《史记》的微旨是“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就明确揭示出《史记》在汉代产生的现实性。政治家的这种总结成败、以利于现实统治的愿望,正好与司马迁写作《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吻合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宣告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过考究历史的发展演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寻求途径。

第二,《史记》是大一统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正像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称道的情景:“至今上即位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能够成为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巨著,与司马迁本人的学识有关,更是其时代的产物。汉武帝时代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为司马迁完成《史记》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第三,天下一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就。汉武帝时代的天下统一,较之中华民族早期商、周时代的统一是时代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汉武帝在汉初的清静无为、与民生息的基础上,发扬“文景之治”的辉煌业绩,并将这一局面推进到了新的高度。司马迁对这种统一的局面抱有赞许的目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①正如杨燕起所指出的那样:《史记》既是大一统的产物,又明确地记述了整个三千年历史的大一统的进程。司马迁肯定大一统的进步意义,这恰恰是秦国的兴起和始皇并吞六国以及汉代的政治业绩,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的作为在司马迁思想中的反映,是司马迁立足于现实而对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集中概括,因此也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样的时代特色^②。

第四,天下一统的兴盛局面,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地域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页。

②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辽阔的西汉王朝版图,使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为形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逸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①。

二 文化整合——《史记》成书的学术背景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学术背景体现出他渊博的学术综合能力和对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一是沿着先秦史书传统。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早在殷、商时代,朝廷就有了记载史事、掌管典籍的人员。甲骨文中称之为“史”、“尹”、“作册”。《尚书·多士》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在殷商时期就有了一定的历史典籍。在春秋战国时期,相继出现了《尚书》、《世本》、《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原始而质朴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极为珍贵的史料,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重要的原始资料。《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初具纪传体裁的规模。《春秋》一字褒贬的写法和“微言大义”的风格,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是我国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它的民本思想、不隐恶、不饰美、颂扬忠烈的进步思想,影响了后代史学家的观点。其精彩细密的叙事风格,委婉巧妙的辞令特点,成为后来史学家的楷模。司马迁修纂《史记》,正是继承发扬了先秦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将史传文学的发展推上了高峰。它完成了由编年体到纪传体的转变,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是史传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对此,张新科总结道:“《史记》的出现,无论从史学意识、史学目的、史学编纂,还是史学规模、史学语言等,都是对先秦史学的一次系统总结,同时又开辟了史学的新道路,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革命。而后来的史学,基本都是沿着司马迁开创的史学道路继续前进,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就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形式。”^②

二是对先秦时期叙事文学与政治哲理著作的继承与发展。先秦时期的叙事文

① 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② 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4页。

学,主要是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他们在叙事方面为《史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史记》吸收了先秦抒情文学的特长,如《诗经》的抒情格调,《大雅》中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也被司马迁纳入《史记》之中。《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对司马迁影响深远。他接受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思想,并通过自己的实践,进而发展为“发愤著书”理论。同时,司马迁还接受了屈原劲直清高的人格与刚正不阿的精神。屈原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已经渗透到了司马迁的血液中,化为司马迁的铮铮铁骨、凛凛正气。而表现在司马迁身上,则是发愤写作《史记》。同时,司马迁还吸取了政治哲理著作如《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等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从而使《史记》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

三是整合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提出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要从六经异传的经说和百家杂语中吸取学术思想理论,在整合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构筑自己的学术大厦。同时,司马迁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以前的史料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整理,所以班固感叹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载间,斯以勤矣。”^①

四是总结文化的价值。正如张新科所言:“《史记》是汉代大一统社会的产物,是一次大的文化综合。”^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史记》是区域文化的一次综合。汉代大一统社会为这种区域文化的综合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无论是哪个区域文化,都纳入汉帝国的文化系统中来。《史记》是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东西南北中,都是炎黄子孙,各民族文化尽管有不同的特征,但都归之于华夏文化这一大系统中。其次,《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是先秦以来各种学派思想的全面总结。《史记》容纳秦汉以前百家而自成一家,进行新的综合,即“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是一个新的综合体,是大一统时代的恢弘气势融合各家之长形成的优势文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第三,《史记》是先秦以来巫、史文化的系统综合。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由巫文化到史

①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② 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9页。

官文化的过程。依现代学者的研究,最早的史官是沟通天人的巫官(天官),史官文化就源于巫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代替巫文化,其主要特征,一方面是把神话历史化,另一个方面是史官文化具有了劝善惩恶的作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直接从先秦史官文化发展而来的,也是对先秦史官文化的最好总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继承、综合巫文化的成分,以此探寻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通古今之变”,就是综合史官文化的成分,总结古今变化的历史规律。

三 父子相传——《史记》成书的家学背景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完成《史记》的撰写,是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氏世典周史,与历史编纂有密切关系。这种家学渊源对司马迁有一定的熏陶。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第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历史上曾经总结了先秦到汉初的学术发展概况,形成了《论六家要旨》。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学,至战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了汉初,总结各种学术流派,分析其对社会政治主张,对当时的统治提供重要借鉴,颇有利于学术发展。司马谈学问渊博,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①。司马谈曾根据道家的观点,写成了《论六家要旨》这篇富有学术和政治意义的论文。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旨》的最终目的,是要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成一家,这也是司马谈设想和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隋书·经籍志二》云:“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说明司马谈对《史记》编纂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史记》的撰写工作由司马谈最初设想提出,由司马迁最终完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满怀情感地记叙了父亲的临终遗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

^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8页。

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去世前夕“所欲论著”的临终嘱托，可以看做是司马迁写《史记》继承其父遗愿的最好证明，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司马谈作史的伟大理想：“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纪传史，颂汉家一统之威德。”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云：“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宋人郑樵《通志·总序》说：“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都肯定了《史记》是司马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并且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史记》中许多篇章是司马谈所撰写。顾颉刚先生就认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酈生陆贾列传》中的《朱建传》、《樊酈滕灌列传》中的《樊噲传》，“此三传成于谈手无疑”②。

第三，司马谈对司马迁的熏陶培养，是子承父业撰写《史记》的重要基础。司马谈对司马迁的熏陶培养，一是表现在司马迁二十岁的壮游，此次壮游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去进行的。因为司马迁在漫游祖国大好河山、开阔眼界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了解和搜求历史故事和文物资料。二是表现在父子两人以修史为己任的相同理想。司马谈在有了撰写《史记》愿望并有积累的前提下，自己事业未竟而生命已结束。多亏有司马迁这样一个薪火相传的好儿子，使他有了进一步完成自己工作的继承人。

四 游历全国——《史记》成书的生活体验背景

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③说明了司马迁游览的社会实践对他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

① 安平秋等主编《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②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6页。

③ 《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在司马迁一生中曾有三次游历的经历。其一是二十岁的壮游,其二是奉使巴、蜀以南之游,其三是扈从汉武帝之游。二十岁的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壮游,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这次壮游中,司马迁广泛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和各地的物产、风土人情,还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上古历史的传说及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司马迁来到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追寻屈原的足迹,并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上做了凭吊。后来他在《史记》中写了有名的《屈原列传》。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率先为其作传,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屈原最早的史料。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还特意追叙了自己当年访古的心情:“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上会稽,探禹穴,访九疑,收集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① 访察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遗址。他北上渡江,过淮阴,访问了汉将韩信的故乡,搜寻了韩信早年在家乡的轶事。“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② 他又至曲阜,观看了孔子留下的遗风。“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③ 途经薛城,访寻了孟尝君的封地。“吾尝过薛,其俗闻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④ 薛地人们的讲述,对于司马迁研究薛地的历史及当地风土人情的渊源,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过徐州,他考察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⑤ 归途路经魏都大梁,观看了信陵君的遗迹。“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这次壮游的收获,为他后来写作《五帝本纪》、《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孔子世家》、《孟尝君列传》、《樊酈滕灌列传》、《越王句践世家》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入仕做了郎中,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的游历——奉使巴、

①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页。

②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30页。

③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7页。

④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3页。

⑤ 司马迁:《史记·樊酈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73页。

蜀以南之游。《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去巡视四川南部和云南边境一带，这一地区属于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司马迁考察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风俗民俗，为他后来写作《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司马迁第三次游历是扈从汉武帝之游。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司马迁作为皇帝的扈从，跟随武帝登泰山封禅，“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又东至碣石、辽西。在这次北游中，司马迁考察了我国北方、东部许多地方。《齐太公世家》云：“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①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写作《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齐太公世家》、《蒙恬列传》、《封禅书》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三次游览的经历，使司马迁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见识和才干，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资料，同时也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这一切对他的政治见解的形成和丰富《史记》的内容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宋人马存评论道：“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噫，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②说明司马迁游历天下的阅历对他性情的陶冶、文风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在行万里路、广泛交游、全方位采集史料等方面

①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70页。

②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无人能与司马迁比肩。

五 李陵之祸——《史记》成书的个人遭遇背景

元封三年(前108年),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一边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边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图书和档案资料,从事写作《史记》的资料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天汉三年(前98年),飞来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惨遭腐刑。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遭遇匈奴的大军,由于寡不敌众,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那些平日赞赏李陵的人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司马迁认为,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所以“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①正是出于对武帝的忠心和公心,出于对李陵的同情和偏爱。因为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而李广又是司马迁笔下的理想人物和歌颂的对象,所以,司马迁爱屋及乌。当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时,司马迁“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司马迁的一片忠心并未被汉武帝明了,反而被加上“沮贰师”、“诬上”的罪名,最后处以腐刑。我们认为,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夸大他的战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为之掩饰。韩兆琦认为,司马迁评说李陵的功过,即使有些不准确,汉武帝也不至于大发雷霆,处之以“极刑”。汉武帝这次对司马迁的动怒,实际上是一种新旧矛盾的总爆发。新的矛盾就是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时的“沮贰师”与“诬上”。“沮贰师”,就是诽谤、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这次讨伐匈奴的主力,他带领三万人从酒泉出发,北伐匈奴。李广利在这次作战中,俘杀敌人万余,自己却损失两万士卒,付出的代价是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0页。

二比一。李陵仅带五千步兵,在这次作战中,牺牲士卒四千六百人,逃回汉朝的有四百余人。而汉武帝为什么袒护、维护李广利?因为他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弟弟。而当时汉武帝之所以派他为统帅,完全是为了让李广利封侯,以博得李夫人的欢心。这就是“沮贰师”的缘由。既然李陵作战如此忠勇,他率领士卒孤军奋战得如此艰苦卓绝,那么李陵兵败的责任应该由谁负责呢?问题自然就转到朝廷方面了,转到了汉武帝的身上,这就是“诬上”。所以,“沮贰师”与“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涉及了汉代政治的一个局部。^①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动怒,也许还有更早的原因,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以“实录”为原则,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真实记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他敢于突破前人唯帝王将相独尊的观念,超越了当朝统治者的皇权意志,以自己独特的标准来衡量人物。对此,汉、魏时期的人们早有论断。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后坐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裴骃《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陵事件是汉武帝动怒的一个导火线,而司马迁写《史记》可能才是汉武帝动怒的真正原因。关于司马迁惨遭腐刑,清代赵铭《琴鹤山房遗稿》卷五说道:“夫迁以救李陵得罪,迁但欲护陵耳,非有沮贰师意也。帝怒其欲沮贰师而为陵游说,则迁罪更不容诛。以武帝用法之严,而吏傅帝意以置迁于法,迁之死尚得免乎?……迁惜《史记》未成,请减死一等就刑,以继父谈所为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诛,然则迁之下蚕室,出于自请无疑也。”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的身心不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得到了升华。诚如李长之所说:“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②

六 成就功名——《史记》成书的个人情绪调整背景

在古代中国,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腐刑。司马迁因李陵之

① 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②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2页。